

9·30运动和 国家罪行

(一) 编者的话 四

“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要注意这些条款，以使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国家，不要成为一个权治国家。”哈达建议，在宪法中加入一个条款：“结社、集会、通信等权利”。

因此，在1945年宪法里有了第28条规定：“结社、集会、以口头和书面等形式发表思想的自由以法律来规定。”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宪法起草者们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有做这些事的权利：“权利”（hak）一词没有出现在第28条。他们只给予立法者提出补充规定来规范这些活动的权利。

1945年宪法给公民的权利很少：有工作和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第27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第29条）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第31条）。明显被遗漏掉的是选举权。1945年宪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怎样选举国会和人民协商会议的代表，而称这一政策将在另一场合来确定。

苏加诺总统决定以1945年宪法取代1950年临时宪法，作为对制宪议会未能于1959年制定新宪法的回应，是印尼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正如萧先生所指出的，1950年临时宪法与1945年宪法不同，它增加了较多的权利：“印尼人民曾在‘统一国家临时宪法’（1950年8月17日至1959年7月5日）下生活，该临时宪法引用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全部内容。”

1945宪法被冻结长达40年后，终于有可能出现积极的变化。在此之前，1945宪法被视为用神圣的布包裹着的对象，不可以触碰而只能放在博物



9·30 运动所发生的逮捕、酷刑

馆。立法者终于意识到，印尼应停止国家依赖于总统一个人拍板（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和新秩序时代）决定法律形式的情况。他们认识到，印尼的国家必须依靠法治。

在法治方面，印尼的确非常落后。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只有一次这种转变。此前，政府有意避开印尼的法治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立法者很多是“新秩序时代”的留用人员，并没有法治的担当。但最终他们意识到并设法解决印尼所必要的法治问题。所取得的变化有赖于1950年的临时宪法的规定。

萧先生指出，共和国开国元勋们所憧憬的印尼是一个法治国家，怎么就没有实现呢？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军队”。

陆军内部的冲突阻碍了文官对国家的控制，从而未能对国家实施法治。印尼军队内部经常发生冲突：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1957年至1960年“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以及1965年9·30运动。

陆军军官们经常抵制总统和议会对军队施加的

影响：1952年事件、1955年班邦·乌托约事件，以及1963-1966年对抗马来西亚时期军队的秘密反叛。

虽然我认为苏加诺及其所谓“有领导的民主”是违反法制国家原则的，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萧先生没有批评苏加诺。许多像萧先生那样的进步政治家都很了解苏加诺，知道他是一个诚实、善意和高尚的领导人。他们看得出来，他在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时，是遵循人权的基本原则的，尽管他并没有用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法律程序来实现这些政策法规。

例如，萧指出，苏加诺在平息“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行动，也不认为那些曾拿起武器与政府对抗的那些人是民族的叛徒。苏加诺并没有下令逮捕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所有党员，尽管这两个党的领导人加入了“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那些被捕的人也很快得到释放和赦免。苏加诺没有下令处决那些叛乱者：“请记住，他们作为前部长和国会议员，苏加诺总统从来没有单方面取消他们有权获得的退

休金！”

这与苏哈托镇压9·30运动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9·30运动实际上并不是“运动”，与“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武装叛乱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苏哈托把它当作借口，实施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屠杀。对比苏哈托的专制，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被苏加诺镇压过的人很难指责他。

虽然《1959年法令》可以理解为应对危机的临时对策，但我认为很难原谅苏加诺没能终止依靠个人绝对权力的制度。他没有拿出恢复法治和民主的路线图。长期的没完没了的“有领导的民主”，最

终促使印尼共产党和陆军各自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出路。

1965年初，陆军和印尼共产党的领导层开始互相猜疑，犹豫是否要先采取行动对对方实施打击。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清楚地表明，陆军将领一直在不断地与美国大使馆联系，并决定等待印尼共产党先采取行动。这些将领并不想对苏加诺总统发动政变，因为总统很受拥护。他们认为最好是等待出现打击印尼共产党的理由，然后逐步甩掉苏加诺总统。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对苏加诺表忠心。9·30运动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机会。萧先生指出：“现在有一点很清楚，9·30运动显然是陆军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借口。”

萧先生意识到，艾地和印尼共产党一些高层领导卷入了9·30运动。然而，他无法理解他们究竟是如何参与以及为什么参与其中。他在监狱期间有机会与几个介入其中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及党员交谈，如艾地的私人助理古斯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穆罕默德·穆尼尔。虽然他们没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从这些谈话中萧先生可以得出结论，在部署9·30运动中起最大的作用的，是一个名叫夏姆的人：“从9·30运动周



9·30 运动所发生的逮捕